

1924-1925年間蘇聯的農村危機與政策調整*

趙旭黎**

摘要

大陸學界廣泛認為，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農民的負擔與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相比有所減輕，社會矛盾總體呈緩和態勢。然而，筆者在研讀1924-1925年蘇聯國家安全機關檔案和農民書信等一手史料的過程中，卻發現與慣常認識相左的大量材料，證明當時蘇聯農村部分地區出現了危機——恐怖行動、「土匪」運動、起義暴動等農民反抗運動此起彼伏，工農聯盟亦出現較大裂隙。這些材料說明學界對新經濟政策具體實施過程的研究仍待深化。本研究發現，1924-1925年農村出現危機的歷史背景，與蘇聯處於社會主義「孤島」的國際環境、邊遠地區民眾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感薄弱，以及為了生存和發展而選擇優先發展工業的國家戰略緊密相關。導致農村出現危機的直接原因，則是農業稅徵收過程的諸多弊端引起農民和主要由農民出身的士兵普遍不滿，而嚴重饑荒又強化了不滿情緒。1924年8月喬治亞農民起義引起蘇聯高層震動，標誌著農村局部性危機的形成。隨後，蘇聯政府在政治上採取「面向農村」的新政策，在經濟上大幅降低農業稅，最終化解了這場危機。但其所帶來的農民收入改善，與蘇聯壓擠農民財富、推進工業以求自存的國家目標有所背離，又為下一階段的剷除富農與農業全盤集體化埋下伏筆。

關鍵詞：蘇聯、農業稅、農村危機、新經濟政策

* 本文是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俄羅斯糧食問題研究(1917-2016)」(批准號17XSS002)的階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1年1月29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12月10日。

**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前 言

1921 年 3 月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誌著新經濟政策時代（1921-1929）的到來。布爾什維克在政治上保持絕對控制的前提下，用稅率減輕的糧食稅取代了軍事共產主義時代引起農民大規模反抗的強制徵糧政策，農民納稅後可自由支配剩餘農產品。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學者普遍認為，作為一項替代軍事共產主義的政策，新經濟政策於 1924-1925 年間漸入高潮，賦予農民一定的經濟自由，恢復了市場和商品貨幣關係，農民負擔相對有所減輕，社會矛盾總體呈緩和態勢。然而，通過研讀檔案材料和農民書信，筆者發現存在大量與學界慣常認識相左的歷史事實。這些史料足以說明，1924-1925 年間由於遭遇嚴重歉收和饑荒，¹蘇聯農業稅政策的諸多弊端引起農民和士兵普遍不滿，導致農村部分地區出現恐怖行動、土匪運動、起義暴動等農民反抗運動，只是由於後來蘇聯政府調整政策，才得以扭轉局勢。筆者將該時期蘇聯農村部分地區在政治、經濟、社會、治安等領域湧現出來的危及政權穩定的負面現象稱為 1924-1925 年的農村危機。須強調的是，探究這場持續兩年局部危機的目的不是要修正學界對新經濟政策的總體評價，因為對新經濟政策的認識必須把握好整體和局部、普遍和個別、主流與支流等的關係，而是要透過相關歷史事實，揭示新經濟政策具體實施過程的曲折性、矛盾性和複雜性，進而豐富學界對此一時期執政黨與農民關係的認知。

自 1980 年代起，新經濟政策問題逐漸成為中國大陸蘇聯史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根據 2012 年出版的《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社會》一書的總結，學

¹ 需指出，學界已公認蘇聯 1921-1922 年間遭遇饑荒，而 1924-1925 年間的饑荒卻經常被忽略。據筆者所見，俄羅斯學界直到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才承認這一問題，而直至 2012 年才有中國大陸學者提及此次饑荒。如今俄羅斯歷史學界已不否認 1924-1925 年發生過饑荒，僅在饑荒的規模上尚有爭論。參見 И. В. Кочетков, “Неурожай 1924 года: масштабы, причин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 ред.,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К 7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члена-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РАН, профессора В. А. Шишкин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05), с. 99-131; 黃立芾等, 《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社會》(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頁 134-135。

者們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於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背景、起訖時間、農村問題（1927-1928 年的糧食收購危機、富農、土地等）、耐普曼（нэпман）²問題、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和評價等 11 個問題上。³大陸學界對新經濟政策具體實施過程的研究相對薄弱。就有關新經濟政策實施過程的已有研究成果而言，主要聚焦於新經濟政策的前期（如研究新經濟政策的起因等問題）和後期（如研究新經濟政策終結的原因、1927-1928 年糧食收購危機等問題），因而對新經濟政策中期的探討有限，尤其缺乏對 1924-1925 年新經濟政策在農村的具體實施過程進行實證研究的成果。⁴筆者注意到，學者們在舉例說明新經濟政策讓農民稅負減輕、生活改善等優點時，往往未提或忽略 1924-1925 年的事例。這種情況很可能與相關檔案尚未解密，或者解密後未能進入研究者視野有關。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蘇聯檔案的解密和出版，大陸學者開始有機會觸及此問題。《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社會》一書和同年發表的〈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農民的社會情緒〉一文已經注意到，1924 年主要因稅負過重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⁵而導致農民社會情緒惡化，但未能指出這是一場農村危機。⁶

² 耐普曼（нэпман）係俄文音譯詞，是由新經濟政策的俄文縮略語（нэп）和複合詞尾碼 ман（狂熱愛好者）構成的合成詞。耐普曼指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而產生的富裕農民、小店主、小廠主及投機商等。

³ 黃立芾等，《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社會》，頁 27-35。

⁴ 中國大陸學界研究新經濟政策前期和後期實施過程的主要代表作有：姜長斌，〈論從新經濟政策向全盤集體化的轉變〉，《史學集刊》，1984 年第 3 期，頁 66-74；金雁，〈論蘇聯 1927-1928 年度的糧食危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4 期，頁 84-92；沈志華，《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章前明，〈1928 年蘇聯糧食收購危機的直接原因——兼論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理論〉，《浙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1 期，頁 97-102；鄭異凡，〈在農民暴動的壓力下——蘇聯新經濟政策的起因之一〉，《探索與爭鳴》，2005 年第 10 期，頁 46-49；馬龍閃，〈取消新經濟政策原因新論〉，《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9 年第 2 期，頁 11-26；鄭異凡，〈蘇維埃政權的危機和列寧的應對之策〉，《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 年第 2 期，頁 183-189；黃立芾等，《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社會》；趙旭黎，〈新經濟政策前期蘇聯糧食政策的負面效應與農民反抗〉，《俄羅斯研究》，2013 年第 4 期，頁 172-190。

⁵ 剪刀差是指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所出現的差額。因用圖表表示呈剪刀張開形態而得名。

⁶ 黃立芾等，《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社會》，頁 133-136；王曉菊，〈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農民的社會情緒〉，《俄羅斯學刊》，2012 年第 6 期，頁 43-48。

儘管蘇聯學者對新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但學者們重點關注的是政治史、經濟史和外交史等領域，較少關注新經濟政策在農村的具體實施過程。在論及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農村、農業問題時，主要關注的是此時期的社會經濟進步，雖有學者注意到農村的各種犯罪行爲、恐怖行動和叛亂等，但多數將其歸入「階級鬥爭」的範疇。⁷另外，受時代局限，相關成果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且史料基礎有待加強。蘇聯解體後，隨著大量檔案的解密乃至出版，已有俄羅斯學者藉助史料研究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危機問題，但多數學者僅注意到經濟類危機。例如，戈蘭德（Ю. М. Голанд）關注到 1923 年的銷售危機，1925-1926 年的商品短缺危機，1927 年的糧食收購危機等；另一位學者亞胡特利（Ю. А. Яхутль）則認為，1925 年蘇聯經歷了一次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⁸茹科夫（Ю. Н. Жуков）雖然認為 1923-1925 年國家經歷了持續性危機，但其側重點是論述經濟問題與黨內政治鬥爭的關係。⁹另外，克利明（И. И. Климин）藉助解密檔案探討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農民反抗運動，對本題研究甚有啓發，但作者仍沒有將農民反抗歸入農村危機的範疇。¹⁰

西方學者對新經濟政策問題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此時期的經濟問題、階級結構、城市家庭生活、鄉村生活、文化生活上，而較少關注新經濟政策在農村的具體執行過程。¹¹最近幾年，西方學界才出現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涉農祕

⁷ 典型代表作有：Г.В. Шарапов,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Т. 1.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1917-1927*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 283-300, 300-304; Ю. А. Поляков, *Переход к нэпу и сов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7).

⁸ 參見 Ю. М. Голанд, *Кризисы, разрушившие НЭП* (Москва: МНИИПУ, 1991); Ю. А. Яхутль, “Кризисы НЭПа: второй кризис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25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ысль*, 2012, №3, с. 64-68.

⁹ Ю. Н. Жуков, *Оборотная сторона НЭП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СССР. 1923-1925 го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ва-Терм», 2014).

¹⁰ 典型代表作有：И. И. Климин,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21-1927)*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

¹¹ 西方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期經濟問題的代表性著作有：Vincent Barnett, *The Revolutionary Russian Economy, 1890-1940. Ideas, Debates and Alterna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西方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期其他問題的代表性著作，請參見黃立菲等，《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社會》，頁 38-45。

密報告文本為基礎，探討新經濟政策時期國家安全機關與農民關係演變問題的著作，但其側重點也不是農村危機問題。¹²

由上述研究回顧可知，學界對此一問題的探究仍有待深入。1990 年代後期至二十一世紀初俄羅斯公開出版的農民書信集、國家安全機關的解密檔案集，以及不同歷史時期出版的俄共（布）代表大會（會議）速記紀錄、國家財政和貿易統計資料等珍貴俄文一手史料，為筆者探查 1920 年代前半期蘇聯宏觀、微觀經濟政治狀況，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使得充分論證本題具備了必要條件。¹³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運用俄羅斯解密一手史料探討如下問題：1924-1925 年蘇聯農村危機形成的歷史背景和原因何在？有哪些主要表現？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如何調整政策，成功避免了危機的蔓延和惡化？另外，成功解決此次農村危機的政策手段為何僅過兩、三年就遭放棄，史達林甚至也進而放棄了新經濟政策？本文將在對 1924-1925 年農村危機進行史學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些關鍵問題做出思考與回答。

¹² H. D. Hudson Jr., *Peasants, Political Police, and the Early Soviet State: Surveillance and Accommodation under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¹³ 這些一手史料主要包括：三種農民書信集，分別是 А. К. Соколов,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7); А. Я. Лившин, И.Б. Орлов, *Письма во власть. 1917-1927. Заявления, жалобы, доносы, письм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м вождям*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一種國家安全機關檔案集：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一種執政黨代表會議速記紀錄：*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兩種財政和貿易統計文獻：И. Я. Вейцер, *Ежегодник хлебной торговли №1. 1925/26 и 1926/27 гг. Часть 2. Таблиц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ркомторга СССР и РСФСР, 1928); *Сектор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ЦСУ СССР, Основные элементы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ССР 1916 и 1923-1927 гг.* (Москва: СТАТГОСИЗДАТ ЦСУ СССР, 1930).

一、1924-1925 年農村危機的歷史背景

1917 年十月革命勝利後，隨著國內戰爭（1918-1920）的爆發，出於對蘇維埃俄國與德國簽署割地賠款的《布列斯特和約》（Брестский мир）、退出一戰的驚恐，以及對蘇維埃政權本能的敵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盟友英、法、美、日等國對蘇俄進行了武裝干涉。因此，初生的蘇維埃政權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俄共（布）本來將俄國革命的前途寄望於世界革命的爆發，但隨著 1919 年德國、匈牙利革命被各個擊破，以及蘇（俄）波（蘭）戰爭¹⁴（1919-1920）的失敗，只有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在內戰後得以倖存。1923 年 10 月德國漢堡工人起義的失敗，標誌著曾被寄予厚望的世界革命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蘇聯領導人悲觀地認為，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成爲一座社會主義「孤島」。

面對世界革命的低潮，蘇聯國內許多人產生了懷疑情緒，對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蘇聯能否依靠自身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產生了疑問。1924-1926 年間，史達林提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主要內容包括：1. 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地方」，一國無產階級能夠首先奪取社會主義的勝利；2. 社會主義在蘇聯建成的標準是：蘇聯無產階級依靠本身的力量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3. 蘇聯能夠保持經濟上的獨立性和建成社會主義。「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統一了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思想，爲黨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其負面作用也非常明顯，主要表現在史達林人爲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錯誤提出了完全戰勝本國資

¹⁴ 關於蘇波戰爭的結束時間，目前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爲是 1920 年 10 月，另一種認爲是 1921 年 3 月。分歧在於，前者是戰爭停火時間，而後者則是正式簽署和約的時間。本文將停火日期作爲戰爭之結束時間。關於戰爭結果，之前蘇聯學者多認爲蘇俄獲勝，但蘇聯解體後國際上的主流觀點認爲波蘭獲勝。從戰後簽署的《里加條約》（Риж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之內容看，蘇俄既割地又賠款，應爲戰敗國。

產階級便標誌著社會主義在一國建成的理論。這為蘇聯後來實施一系列超越發展階段、急於過渡的激進措施奠定了理論基礎。¹⁵

自 1924 年起，雖然蘇聯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建立外交關係，但意識形態上的極端對立，使得西方國家對蘇聯的敵視從未停止，布爾什維克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1925 年 1 月，史達林在分析國際形勢時指出：「戰爭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當然不是明天，不是後天，而是幾年以後）。」¹⁶同年 5 月，他又強調：「只要資本主義包圍存在，就一定會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武裝干涉的危險。」¹⁷從此後世界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史達林對當時國際局勢的判斷基本正確。

從國內政治環境看，蘇維埃政權建立後，一直面臨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即邊遠地區很多民眾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感較弱。雖然取得了內戰的勝利，但在 1920 年代前半期，蘇維埃政權對中亞、西伯利亞和遠東等邊遠地區的控制和管理始終非常有限。例如，1920 年 4 月至 1922 年 11 月，布爾什維克為在蘇俄和被日本佔領的濱海地區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成立了一個名義獨立的遠東共和國，雖然實際受蘇俄政府控制，但有獨立的國旗、國歌、國徽，發行本國貨幣，與美國、中國等國開展對外貿易。根據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匯報，1923 年春夏，包括原遠東共和國在內的邊遠地區「農村蘇維埃機關的組織工作最差」，「有很多反蘇分子在活動」。¹⁸再例如，自 1918 年起至整個 1920 年代，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巴斯馬奇運動（басмачество）幾乎綿延整個中亞地區，在穆斯林農牧民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些因素肯定會影響到上述邊疆地區的民眾對中央政權的政治認同感，尤

¹⁵ 向祖文，《蘇聯經濟思想史——從列寧、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209-210，218-219。

¹⁶ 《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卷 7，頁 14。

¹⁷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99。

¹⁸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 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27, 141.

其當他們面臨其他政治選擇之時。這也是後來 1924-1925 年蘇聯邊疆地區出現各種「匪患」乃至農民暴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1 年初，主要因暴力徵糧導致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和喀琅施塔得（Кронштадт）水兵暴動，迫使列寧下定決心放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實施新經濟政策。從 1922 年開始，國家終於擺脫了長達七年的戰爭陰影，進入和平發展時期。由此，制定國家生存和發展戰略成爲擺在領導人面前的首要任務。

筆者認爲，有兩大主要因素促使黨內高層選擇了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戰略。國內方面，新經濟政策初期，蘇維埃國家的工業發展極其落後。1921 年初，蘇俄工業生產不到戰前的十分之一，煤產量不到戰前的十分之一，鑄鐵產量僅爲正常產量的四十分之一。¹⁹1923 年，工業只恢復到戰前的 39%，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尤其薄弱。²⁰國際環境方面，蘇聯成了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一個社會主義「孤島」。正是在國際緊張局勢和戰爭威脅的推動下，蘇聯高層做出了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決定。列寧甚至提出：「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能成爲獨立國家。」²¹從 1924 年起，蘇聯開始全方位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

確定優先發展工業的戰略後，工業化的資金來源成爲俄共（布）黨內各派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1924-1925 年，這種爭論主要是表現爲剝奪農民還是把農民作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平等夥伴之爭。在一黨專政的國家內，對同一問題的不同看法或爭論成爲執政黨內派別鬥爭的主要武器之一。屬於托洛斯基派的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Е. А.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於 1924 年提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即依靠犧牲和剝奪農民來發展工業）；²²不論是布哈林，還是

¹⁹ 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著，周任辛譯，《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 5。

²⁰ А. Ф. Агарё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2005, <https://uchebnikfree.com/russia-history/krizisyi-nepa-30968.html> (accessed April 3, 2019).

²¹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卷 43，頁 282。

²² 葉·阿·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著，紀濤、蔡愷民譯，《新經濟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頁 172。

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的「三駕馬車」均明確反對托洛斯基派的這種觀點。雖然當時忙於黨內鬥爭的高層領導人對此問題爭論不休，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卻總是依靠農業積累工業化建設的資金。究其原因，一是因為蘇聯當時還是一個農業國家，1925 年農業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佔 57.46%，²³農民則佔全國人口 80%以上，農業和農民所佔有的國民財富比例較大；二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在內戰期間形成的剝奪農民糧食、物資和資金的習慣，並沒有隨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而徹底改變；三是因為俄共（布）「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指導思想是忽視、輕視乃至利用和犧牲農民利益。²⁴俄共（布）是工人階級政黨，認為農民屬於小私有者，不願接受國家監督，是國家落後的根源。轉向新經濟政策後，這種思想沒有根本改變。

眾所周知，近代以來英法等國工業崛起的歷史證明，發展工業必須以農業高度發展為前提。然而，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羸弱的農業尚無法給工業建設提供足夠支援。由表 1 可知，因多地歉收，1924-1925 年度政府獲得的糧食總量比 1923-1924 年度減少了 28%，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 1909-1913 年政府年均獲得糧食總量相比，降幅高達 69%。²⁵不但如此，人口問題和恢復糧食出口又加劇了糧食緊張程度，蘇聯農業甚至連養活國家逐年增長的人口都成問題。隨著和平建設時期的到來，蘇聯人口快速增長。由表 2 可知，全國人口總數 1924 年比 1923 年增長 248.2 萬人，1925 年又比 1924 年增加 303.4 萬人。人口持續較大規模增長，必然會加大糧食消費需求。與此同時，作為農村主要勞動力的青壯年人口在此期間卻大幅減少。1924 年和 1925 年，因參軍、進城務工和其

²³ 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98。

²⁴ 1928 年，取得黨內鬥爭勝利的史達林將這一做法合法化，推出「貢稅論」，即社會主義國家籌集資金搞工業化，既不能走資本主義國家掠奪殖民地的道路，也不願借貸奴役性的外債，只能靠內部積累，向農民徵收「貢稅」。參見《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卷 11，頁 139-140。

²⁵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政府僅以採購方式獲取糧食；而 1923-1924 年蘇聯政府既通過糧食實物稅，又通過商品交換獲取糧食；1924-1925 年因政府取消糧食實物稅，全面推行貨幣稅，所以政府只能通過市場獲得糧食，以採購方式進行。鑒於以上原因，筆者在此只能用「政府獲得的糧食總量」這種措辭來表示政府通過各種途徑（無償的實物稅方式和有償的採購方式）從農民處獲得的糧食總量。

他原因，分別約有 250 萬和 300 萬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²⁶他們不但無法從事農業生產，反而增加了城市的口糧負擔。另外，此時期糧食的大量出口，更加劇了糧食緊張情況。為進口英、德、美等國的先進工業設備，蘇聯政府從 1922-1923 年開始恢復傳統的糧食出口，當年即出口 71.39 萬噸，1923-1924 年出口量比上年翻了兩番還多，達 298.52 萬噸，是當年政府獲得糧食總量的 41.9%。²⁷

表 1 1923-1924、1924-1925 年政府獲得的糧食總量與一戰前的比較（單位：萬噸）

年分	1909-1913（年均）	1923-1924	1924-1925
政府獲得的糧食總量	1,670	712.96	513.71

資料來源：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彙編》（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頁 241。И. Я. Вейцер, *Ежегодник хлебной торговли №1. 1925/26 и 1926/27 гг. Часть 2. Таблицы*, с. 2-5.

表 2 1922-1925 年的蘇聯人口（單位：千人）

年分	人口總數（年初）	人口自然增長數
1922	136,909	677
1923	137,487	2,482
1924	139,969	3,034
1925	143,003	2,690

資料來源：Е. М. Андреев, Л. Е. Дарский, Т. Л. Харьковская, *Насе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22-199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с. 118.

國家確定的生存和發展戰略要求必須加速發展工業，可是羸弱的農業卻無法給工業化建設提供足夠的資金和原料。在如此矛盾的情況下，蘇聯政府若想

²⁶ Сектор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ЦСУ СССР, *Основные элементы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ССР 1916 и 1923-1927 гг.*, с.7. 250 萬和 300 萬這兩個數字是筆者根據書中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的。

²⁷ И. Я. Вейцер, *Ежегодник хлебной торговли №1. 1925/26 и 1926/27 гг. Часть 2. Таблицы*, с. 28.

實現目標，只能採取比較熟悉的手段——即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曾大量使用並卓有成效的強制和暴力措施。雖然新經濟政策時期社會緊張和對立的氛圍明顯緩和，但是內戰時期形成的垂直行政管理體系卻沒有改變。繁重的農業稅徵收任務必然要求各級黨政機關自上而下開足馬力，徵稅任務逐級下達至基層，柔性執行空間無從談起。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形成的以強制和暴力手段對待農民的思維慣性和政策慣性，並未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到來而出現根本變化。譬如，在新經濟政策初期（1921-1923），蘇維埃政權針對農民的強制和暴力手段以及農民的反抗運動從未停止，²⁸因為基層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仍停留在軍事共產主義年代，在工作中習慣用簡單粗暴而有效的強制措施。

綜上所述，在新經濟政策之初的三、四年內，蘇聯高層在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做出了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重大決定，而這一重大抉擇，迫使布爾什維克政權陷於矛盾的困境：蘇維埃國家初建，內無資金積累；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與敵視，外無資本注入；蘇維埃國家是社會主義政權，又不能掠奪殖民地財富。因此，工業化資金只能主要通過提高農民稅負，由農民負擔。新經濟政策實施初期，在農民仍需寬鬆環境休養生息的情況下加重稅負，嚴重違背農民利益，因而只能靠強力實現，這必然引發農民反抗。上述矛盾而無奈的困境，形成了 1924-1925 年蘇聯農村危機的複雜歷史背景。

二、1924-1925 年農村危機爆發的原因

自然災害和饑荒背景下政府徵稅過程中的政策措施不當，是造成 1924-1925 年蘇聯農村局部性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新經濟政策時期，政府主要通過兩種途徑獲取糧食：其一是糧食稅，即無償獲得的部分；其二是商品交換（後來變為自由貿易），即有償獲得的部分。就糧食稅而言，該名稱實際只使用一

²⁸ 相關具體情況，請見趙旭黎，〈新經濟政策前期蘇聯糧食政策的負面效應與農民反抗〉，《俄羅斯研究》，2013 年第 4 期，頁 172-190。

年，之後幾乎每年糧食稅的名稱和徵收方法都有變化。1922 年徵收統一實物稅；1923 年 5 月開徵單一農業稅，實物和貨幣皆可繳納；自 1924 年 1 月 1 日起，停徵實物稅，全面徵收貨幣稅。這意味著政府只有通過市場（以收購的方式）才能獲得糧食。儘管農民歡迎貨幣稅，但是 1924-1925 年的單一農業稅遠未達到讓農民樂觀的程度。雪上加霜的是，徵稅運動中的四大弊端反而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一）將牲畜納入徵稅對象

貨幣稅與實物稅的徵收方法和手段大不相同。全面徵收貨幣稅必然要求改革單一農業稅的徵收方法。1924 年 4 月 30 日，政府頒布《關於單一農業稅條例生效的法令》，規定稅額的確定方法：首先，計算每家農戶的耕地與割草場面積、牲畜數量，其中割草場面積和牲畜數量均需按一定係數換算為耕地面積（俄畝數）；其次，取該省當年平均收成數，確定各種農作物收成的均價；最後，給各省分配總稅額。²⁹與 1923 年的法令內容進行比較，可知較大的變化是將牲畜納入徵稅對象。³⁰

1920 年代前半期，蘇聯畜牧業迅速恢復，牲畜數量增長很快。由於糧價相對較低，很多農民繳納單一農業稅不是靠售糧，而是靠出售畜產品，特別是小牲畜。³¹因此，畜牧業在農戶收入中所佔比重逐漸增大。不但如此，在蘇聯農村，以馬、牛為代表的大牲畜具有重大意義。它們是農村的主要生產工具，為日常生產提供耕作、馱運、騎乘的主要動力，並且牲畜糞是廐肥的主要來源，而廐肥的數量和品質可決定來年農作物收成。

²⁹ “О введении в действ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о едином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м налоге,” April 30, 1924, http://www.libussr.ru/doc_ussr/ussr_2009.htm (accessed March 13, 2018).

³⁰ 在 1923 年 5 月單一農業稅的徵收方法中，牲畜只是劃分徵稅級別的特徵之一，不是徵稅對象。而在 1924 年 4 月 30 日的新法令中，牲畜真正成了徵稅對象。參見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и др., *Финансов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7), с. 489-490.

³¹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李可夫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18。

蘇聯政府把牲畜納入單一農業稅徵稅對象後，按照稅法，農民只要多養牲口就必然多繳稅。如果為降低稅負而少養牲口，則不但會造成農業生產缺乏畜力支持（耕作、馱運、騎乘等），而且還會導致農戶廩肥匱乏，進而使得土地肥力不夠，糧食產量自然低。由是，該政策的實施讓農民進退兩難，倍感困惑和不滿。1924年12月4日，沃羅涅日省羅索希縣（Россошанский уезд）農民記者拉普季耶夫（Ф. Т. Лаптиев）在信中寫道：「現在養頭牲口比養活自己還費錢。這頭牲口要交稅，那一俄畝地既要養這頭牲口，還要養活自己，為這頭牲口花的錢數都數不過來。」他建議：「永遠不要提高稅率，……否則我們在牲口上交的錢要多於我們擁有的土地。」³²不僅如此，甚至蘇聯高層領導人都指斥牲畜徵稅乃稅收第一大弊端。1925年4月27日，位高權重的蘇聯計畫委員會主席瞿魯巴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指出：「稅收中最大的毛病就是牲畜徵稅。」³³瞿魯巴曾長期擔任糧食人民委員，非常瞭解農村情況，他直言不諱的講話概括了農業稅改革一年來的實情。如果說農民抱怨牲畜被納入徵稅對象是因其自身利益嚴重受損的話，那麼黨的高級領導人瞿魯巴的發言則說明這一問題已經非常嚴重。

（二）應徵稅額公布太晚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蘇聯計畫委員會主席瞿魯巴還指出單一農業稅的另一重大弊端——政府公布當年應徵稅額的時間太晚，農民無法根據應繳稅額來確定種植計畫。根據該次代表會議的速記紀錄檔案可知，瞿魯巴在發言中透露，個別地區有時遲至10月才公布當年應徵稅額。這是因為，1924年4月30日的新稅制規定，稅額與當年莊稼平均收成額掛鉤，收成數額確定後，才給納稅人發稅額通知書。然而，確定收成額需經一系列步驟（觀測收成、彙報收成數、確定稅額等），均需不少時間。況且，中央確定的是各省平均收

³² А.К.Соколов,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 108.

³³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с. 64.

成額，然後按省—縣—鄉—村之順序逐級通知，各地各級政府均有權酌情調整收成額。因此，納稅人一般均需等待很久才會收到稅額通知書，此時農民往往早就為繳稅而開始出售農產品。³⁴農民對此非常反感——春天播種時不知當年應繳稅額，無法依稅額確定種植計畫。

解密檔案中保留了很多相關歷史資訊。1925 年 3 月，《農民報》編輯部就農民來信涉及的主要問題向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莫洛托夫做了專題彙報，提到 1925 年 2-3 月農民來信中有一些關於稅收問題的建議：「稅額應降低，農民應在春天就早點知道稅額。〔宣布徵稅額度的〕日期應固定不變。」³⁵可見，徵稅數額公布太晚是困擾多數農民的主要問題之一。

此外，有的政權機關公布兩個繳稅日期，變相迫使農民交滯納金。據統計，1924-1925 年度蘇聯全國僅單一農業稅滯納金就收入 313.22 萬盧布，而 1925-1926 年度滯納金收入額就比上年增長 74%，達 544.31 萬盧布。³⁶這對面臨饑荒困境的農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額外開支，同樣會引起不解和不滿。例如，1925 年 1 月 31 日，在梁贊省梁贊縣波波季因諾鄉(Поподь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農民大會上，有人指出，稅額通知書與特殊命令上的繳稅日期不一致，這是農民被迫交滯納金的根源，並詰問：「單一農業稅的繳納日期應該是哪一種？按稅額通知書上寫的，還是按特殊命令上的日期？」³⁷可見，由於蘇維埃政權在工作上存在失誤，規定兩種不同的繳稅日期，導致許多農民被迫繳納滯納金，引發不滿情緒。

³⁴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с. 63-64.

³⁵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207.

³⁶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и др., *Финансов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497-498.

³⁷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203, 204. 檔案材料提供的這一特殊命令規定，從 1924 年 10 月底至次年 2 月初，在三、四個月時間內，共分 7 次繳納單一農業稅，每次須繳足一定的比例。

（三）饑荒背景下的過重稅負

1920 年代前半期，因連年征戰以及受 1921-1922 年饑荒的影響，蘇聯農業生產的恢復非常緩慢。以穀物生產為例，1923 年和 1924 年的總產量分別是 1913 年總產量的 74% 和 67%，至 1925 年才恢復至戰前水準的 95%。³⁸ 農業生產的遲滯導致 1920 年代前半期國家糧食收購額一直在低位徘徊。農業還未恢復，1924-1925 年蘇聯各地又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導致多地歉收嚴重。據俄羅斯學者統計，1924 年全蘇有 4,920 萬農民（佔全蘇人口的 35.2%）遭遇歉收，6,000 萬俄畝土地（佔全蘇播種面積的 60.3%）屬歉收區。³⁹ 嚴重歉收導致全國各地出現饑荒。1924-1925 年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給黨和國家領導人提供的各類情報彙編中，充斥著各地有關歉收和饑荒情況以及挨餓人數的情報，而且饑荒是這一時期情報彙編的重要主題之一。⁴⁰ 例如，1924 年 7 月，吉爾吉斯自治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Киргизская АССР）⁴¹ 阿克莫林斯克省（Акмоли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有 5 萬到 6 萬人挨餓，個別地區 40% 居民挨餓；奧倫堡省有人餓得吃動物屍體；亞塞拜然（Азербайджан）某縣有 2 萬人挨餓，個別村莊甚至有人餓死；1925 年 3 月，薩拉托夫省有約 30 萬饑民；5 月，頓河州 25% 居民挨餓；坦波夫省僅一個鄉就有 1.6 萬人挨餓，佔該鄉人口的 60%。⁴²

歉收和饑荒讓本就羸弱的蘇聯農業更加雪上加霜，也讓蘇聯農民對政府稅收的增長極其敏感。遍地饑荒時，廣大農民自身難保，遑論給國家如數繳稅。

³⁸ 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彙編》，頁 135。百分比是筆者根據書中提供的數字計算得出的。

³⁹ И. В. Кочетков, “Неурожай 1924 года: масштабы, причин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К 7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члена-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РАН, профессора В. А. Шишкин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 99-100.

⁴⁰ 涉及此時期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具體情況的原始檔案材料，可參見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28-236, 244-245, 321-322.

⁴¹ 吉爾吉斯自治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1920-1925）是今哈薩克共和國的舊稱，歸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⁴²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28-229, 231, 244-245, 289, 321-322.

有時，即使稅負確有減輕，但對遭重創的農民來說，仍是不能承受之重。從常識出發，農民對徵稅有抱怨乃至絕望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1924 年 9 月 15 日，烏克蘭哈爾科夫省阿赫特爾卡專區（Ахтырский округ）村民納魯斯別克（Нарусбек）在信中說，很多農民哭著抱怨政府在莊稼絕收之時仍強制徵稅：「我怎能不哭呢？今年收成這麼差，種子都收不回來，可現在卻有人來讓我交稅。……我們自己都沒飯吃了，他們卻說，先交一半稅吧，否則利息還會漲。……農民今年的生活很糟糕，但更糟的是，我們這裡的莊稼全部絕收。」⁴³ 這位農民在信中提到的情況，檔案材料中還有很多。譬如，1925 年上半年坦波夫省一位農民給在紅軍服役的兒子寫信：「我們這裡……今年因為歉收，饑荒即將到來。糧食稅不用說都必須上繳……」來自坦波夫省的另一封來信則說：「比去年還要糟糕，我們的生活已經註定了，稅啊稅，無邊無際的稅。」⁴⁴

在普遍徵收貨幣稅，農民交稅必須出售農產品的情況下，又出現了以往交實物稅時不曾出現的新情況：農民上繳的貨幣稅額雖未增加，但因糧價下跌，需出售更多糧食才能繳足農業稅，導致其實際稅負增加。糧價下跌與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這一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經濟的痼疾有關。政府用行政手段人為調低農產品價格，調高工業品價格，勢必加重農民的繳稅負擔。例如，1924 年 10 月，白俄羅斯莫吉廖夫省莫吉廖夫縣什克洛夫鄉黑麥價格下跌，導致農民實際應繳稅額幾乎增至上年的三倍。⁴⁵

農民過重的稅負不僅體現在單一農業稅上，還涉及苛捐雜稅。1925 年初，梁贊省梁贊縣波波季因諾鄉農民除單一農業稅外，還需繳納農業稅的 35% 以滿足地方需求，此外還要承擔鄉執委會和醫院的泥炭取暖費、警察局馬匹飼料費、學校教材費和取暖費等，且所有費用都是強制徵收，以至白俄羅斯維捷布

⁴³ А. К. Соколов,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 107.

⁴⁴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212.

⁴⁵ А. Я. Лившин, И. Б. Орлов, *Письма во власть. 1917-1927. Заявления, жалобы, доносы, письм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м вождям*, с. 380-381.

斯克省（Витеб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波洛茨克專區（Полоцкий округ）多位農民在給《貧農報》的信中尖銳指出，「單一農業稅」名稱極具虛偽性。⁴⁶

儘管前引書信資料包含了不少農民對稅收和各項雜費的情緒化表達，但對揭示該時期農民稅負過重的歷史事實無甚大礙。因為，官方統計數字也印證了農民稅負的確非常重。其中，1924-1925 年度全國農業稅總額比上年度增加 39.4%；算上副業稅、所得稅、消費稅、海關稅和印花稅等，蘇聯公民稅負總額比上年度高 68.4%；平均每人稅負額比上年度增長 60%。⁴⁷在嚴重饑荒背景下，陡然大幅增加的稅負極易讓農民陷入困境。這也是農民在前述私人書信中不吝書寫各種不滿心緒的根本原因。

（四）任意妄為和暴力徵稅

雖然新經濟政策時期國家政權機關的強制和暴力行為比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少，但筆者仍然在書信和檔案中發現許多政權機關（尤其是基層）工作人員胡作非為，乃至暴力行徑的例子。這讓筆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此時期稅收政策在農村基層的實際執行情況很可能與學界之前的估計相去甚遠。

1924 年底 1925 年初，布良斯克省（Бря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別熱茨克縣（Бежецкий уезд）一名團員給《農民報》寫信，抱怨基層蘇維埃領導人挪用稅款喝酒：「農業稅把我們村折磨苦了，折磨人的是坐在蘇維埃裡的我們的共產黨員兄弟。他們對農民的扒皮比沙皇時期還厲害。……只要我們愚昧的農民把很少的錢交給村蘇維埃，他們就拿錢買酒喝。」⁴⁸這樣典型的胡作非為，肯定讓農民心寒，嚴重破壞了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譬如，1925 年 2 月 4 日，布良斯克省謝夫斯克縣（Севский уезд）一名退伍士兵、村蘇維埃委員給中央機關寫信：「食物早就沒了，可卻強徵各種雜稅。為收農業

⁴⁶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76, 204.

⁴⁷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и др., *Финансов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833-834. 百分比是筆者根據書中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的。

⁴⁸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115.

稅，趕走了農民最後的羊、豬、牛、馬，拿走了各種傢俱、衣服等。……農民非常厭惡政權的此類行爲。」⁴⁹農民之所以在和平時期仍對執政者及其代表產生「厭惡」情緒，是因為他們的某些行徑已經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線。

另由 1925 年上半年北高加索軍區士兵收到的家書可知，很多稅務人員的暴力行徑與搶劫無異。斯摩倫斯克省軍屬曰：「全副武裝的三人組不知何故搶糧食，毫不留情地搶走牲畜、衣服、靴子、頭巾、裙子等物。」坦波夫省軍屬寫道：「稅可把我們害苦了。東西都被賣了，搜查出黑麥，翻箱倒櫃。這是光天化日下的搶劫。」⁵⁰農民對搶劫者會產生什麼情緒？史達林 1925 年 6 月指出這種行爲對農民與蘇維埃政權關係的惡劣影響：「搗毀那些力量單薄的納稅者的穀倉，拆掉他們的屋頂」，只會「破壞農民對無產階級、對國家的一切信任」。⁵¹

一旦農民對無產階級、對國家的一切信任被破壞殆盡，站到蘇維埃政權的對立面也就不足爲奇。在這種情勢下，蘇維埃政權對農民採取了鎮壓措施，主要有沒收農具、牲畜，查抄住房，甚至逮捕。查抄財產的規模很大，1924 年 12 月庫班專區有五千餘名農民被查抄財產，其中兩千位農民的財產被拍賣。⁵²被捕農民的規模更大，1923 年 12 月至 1924 年 2 月，斯塔夫羅波爾省逮捕了 10,479 人；部分省僅 1924 年 4 月平均每省就有數千人被捕，多者如斯塔夫羅波爾省有約 2.5 萬個農民被捕，辛比爾斯克省也逮捕了一萬多個農民。⁵³

據解密檔案可知，1924-1925 年蘇維埃政權對農民採取的鎮壓措施雖未到全域性的程度，但範圍也已相當大——至少涉及白俄羅斯、烏克蘭、中央區、

⁴⁹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116.

⁵⁰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209-210, 212, 215.

⁵¹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147。

⁵²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67.

⁵³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84, 195.

西北部、東南部、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中亞和西伯利亞等地的 14 省。⁵⁴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在呈交給中央領導人的〈1924 年 4 月蘇聯政治局勢綜述〉中總結道：「單一農業稅的徵收進程緩慢，幾乎都需對納稅人採取大規模鎮壓措施才能收上來，這仍是導致農村騷動的主要問題。」⁵⁵ 這一總結不僅表明官方承認暴力徵稅在農村具有普遍性，而且說明這是導致農村騷動的主因——由於農民難以忍受被他們視為「搶劫」的大規模暴力徵稅，本能地產生憎恨與反抗情緒，蘇聯農村局部地區因而出現騷動。

三、1924-1925 年農村危機的表現

前述蘇聯農業稅徵收運動的四大弊端，致使農民產生失望、反感、厭惡、抱怨等各種負面情緒。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這些負面情緒又促使農民針對基層政權及其代表人物發起包括恐怖行動、「土匪」運動、武裝暴動在內的反抗運動。農民起而反抗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執政者，而執政者又暴力鎮壓農民反抗，說明蘇維埃政權標榜和鼓吹的「工農聯盟」出現了巨大裂隙。這意味著 1924-1925 年的蘇聯農村正經歷一場局部危機。

國家安全機關負責人在 1924 年年中便已掌握農村危機即將到來的情報，並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專題報告，提出應儘快設法將危機控制在局部的建議。1924 年 6 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局長捷爾任斯基在給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因糧食歉收導致的農民運動前景報告〉中，非常準確地概括了當時蘇聯農村令人不安的總體局勢：「由於許多地區（伏爾加河流域、庫班、頓河州等地）饑荒即將到來，必須強烈關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關於農民及其政治情緒的情報。這些情報包含某些危險的徵兆，如不及時採取合理措施，將其控制於局部地

⁵⁴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81, 192, 194-195, 254, 267.

⁵⁵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94.

區，……這些徵兆的進一步發展和加深，將導致國內社會和政治局勢的惡化。」⁵⁶遺憾的是，這段預警性分析並未引起高層重視。

解密檔案顯示，1924 年夏天之後，農民反抗運動規模果然不斷擴大，主要表現為「恐怖行動」、軍隊不滿情緒、「土匪運動」和武裝暴動等，以及工農聯盟出現的裂隙等。

（一）工農聯盟出現裂隙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過，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無產階級政黨需與農民結成聯盟。十月革命後，俄共（布）領導層也在實踐中總結經驗，認為必須堅持工農聯盟的方針。列寧認為，內戰時期無產階級與農民結成了「軍事聯盟」，新經濟政策時期則與農民結成經濟聯盟。⁵⁷1923 年 1 月，列寧在其最後的文章中告誡全黨，要注意並防止工農之間可能產生的任何分裂，認為「共和國的命運」歸根到底將取決於工農聯盟是否牢固。⁵⁸遺憾的是，列寧去世不久，他的告誡便不幸言中了。

雖然官方一直宣傳工農聯盟非常重要，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尤其是在基層，工人和農民事實上是不平等的。這與官方宣傳的「工農聯盟」論調形成明顯悖論，也給工農聯盟和城鄉關係帶來負面影響，引起農民廣泛不滿。

首先，工農經濟上的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上。1925 年上半年，農民在書信中對工人表達了嚴重不滿：「工人過得比農民好，政府更關心工人，農民過得很不好，工業品很貴，糧食卻很便宜。」⁵⁹首都附近的農民則直接提出工農不平等問題。1925 年 4 月，莫斯科省一村蘇維埃改選時，

⁵⁶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97.

⁵⁷ 張曉山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農業、農村和農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244、242、252。

⁵⁸ 《列寧全集》，卷 43，頁 377。

⁵⁹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210.

農民提出：「蘇維埃政權給工人的多，卻一點沒給農民。鬧革命不應指望工人，而應指望農民，否則農民會向工人宣戰。」⁶⁰在信中表達出強烈不滿情緒。

其次，工農政治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現在憲法規定的政治權利方面。1927年3月，雅羅斯拉夫爾省雅羅斯拉夫爾縣一村民在信中寫道：「憲法第9條規定，工人在代表大會上的代表資格是1人代表2.5萬居民，而農民卻是1人代表12.5萬。作為農民，我感覺……這裡有親兒子和乾兒子的區別。農民只有五分之一的選舉權。」⁶¹這項規定明顯與「工農聯盟」背道而馳，是農民不滿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工農不平等還體現在日常生活中。1925年6月，來自阿克莫林斯克省（今哈薩克北部）科克切塔夫縣（Кокчетавский уезд）巴爾卡申諾鄉（Балкаш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博戈斯洛夫斯科耶村（Богословское）的農民記者列·亞羅沃伊（Л. Яровой），報導了一起城市青年挖苦嘲弄農民的事件：「6月2-3日阿特巴薩爾集市（Атбасарская ярмарка）⁶²期間，許多農民從200俄里⁶³外的偏僻農村趕來。集市第一天結束後，農村青年全都衝向花園去看比賽、聽音樂。門票15戈比，雖然很便宜，但並非每人都有錢，沒錢者都逃票擠了進去。……城市青年立刻變成憲兵，叫喊著、吆喝著、吹著口哨，把沒票的農村青年一個個趕出大門，摘下他們的帽子，扔到大門外……這就是城市青年對農村青年的態度。城市大眾對農民的這種看法必須徹底根除。」⁶⁴由報導可知，農民記者非常不滿城市青年對待農村青年的態度。這反映出，工農聯盟的裂隙已經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⁶⁰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209.

⁶¹ А. К. Соколов,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 129-130.

⁶² 阿特巴薩爾集市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阿特巴薩爾市附近的傳統夏季集市，位於古老的商路上，來自中亞塔什干和布哈拉等地的商人都雲集於此，是交換工業製成品與農產品的大型貿易中心。

⁶³ 俄里是俄國傳統距離單位，1俄里約等於1.0668公里，200俄里約為213.36公里。

⁶⁴ А. К. Соколов,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 131.

最後，蘇維埃政權不斷宣傳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與工農聯盟相左，引起農民的困惑和不滿。1925 年阿穆爾州一農民給《農民報》寫信：「農民從來沒有如此敵視過工人，尤其是共產黨員。……他們的神聖口號（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敵對的根源。將軍和地主消失了，共產黨無法對其專政，只好專政農民。」⁶⁵農民對工人的敵視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使工農聯盟的裂隙越來越大。

此外，暴力徵稅也導致工農聯盟遭破壞。如前文引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檔案所言，農業稅的徵收「幾乎都需對納稅人採取大規模鎮壓措施」，這說明，正是依靠普遍的大規模暴力措施，政府才完成了徵稅任務。施暴與被施暴的關係，使農民與蘇維埃政權關係極端對立，農民也因此掀起了反抗蘇維埃政權的運動。在官方檔案中，這些農民反抗者被稱為「土匪」。「土匪」並非褒義詞，很多時候甚至是執政者對威脅其統治基礎的敵對勢力的蔑稱。用該詞指稱農民，本身就表明工農聯盟正在崩解。

（二）針對基層蘇維埃的恐怖行動

所謂「恐怖行動」，是解密檔案中的措辭，主要指農民針對基層蘇維埃工作人員和親蘇維埃分子等非武裝人員（包括村蘇維埃主席和普通工作人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少先隊員、農村通訊員、貧農等）的毆打、謀殺、暗殺、縱火等行爲。從恐怖行動針對的對象可知，它本身就有明顯的政治性。

1924-1925 年，農村有大量針對基層蘇維埃的恐怖行動。根據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官方統計，1924 年蘇聯全國共發生 339 起恐怖行動，1925 年則發生了 902 起恐怖事件。⁶⁶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局長捷爾任斯基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1924 年 3-6 月，主要因徵稅運動，西伯利亞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省、托木斯克省各縣的 16 個鄉發生一系列毆打和殺害共產黨員、縱火焚燒村蘇維埃

⁶⁵ А. К. Соколов,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 128.

⁶⁶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032.

委員住房的事件。類似事件也發生在庫班和北高加索的幾處地方。」至年底，恐怖行動的規模更大：「多數恐怖行動都有政治色彩，目的是讓農村親蘇維埃積極分子失去活動能力，讓政治文化工作癱瘓。12月共有59起個人恐怖行動。此外，還有群體性恐怖行動，例如薩拉托夫省針對眾多守法納稅人的縱火行動等。」檔案中一例，其形象說明恐怖行動的殘酷性：1925年1月，莫斯科省克林縣（Клинский уезд）三農民因糧食稅殺死本村蘇維埃主席，他的頭部被連捅16刀。⁶⁷

農村通訊員也是恐怖行動的主要目標之一。這一群體指的是參加官方報刊報導工作的農村積極分子，因參與「揭發」「蘇維埃社會的缺點」（史達林語），對農村各種「醜惡現象」進行失實報導而獲得官方的各種好處，被同村人認為是告密，遭人憎恨、攻擊乃至被殺。⁶⁸根據官方資料，1924年春至1925年8月，全蘇有140名通訊員遭攻擊，其中25人被殺。⁶⁹遭攻擊和被殺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因各大報刊紛紛討論類似事件，引起社會輿論廣泛關注。1924年3月28日，烏克蘭奧德薩省尼古拉耶夫專區得莫夫卡村（Дымовка）通訊員馬林諾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Малиновский）被殺後，尤其是當年7月抓到兇手至10月公開審判期間，該案得到地方報刊（如《奧德薩消息報》）和中央級大報（如《真理報》）廣泛報導以及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繼而引起黨內高層的重視和警覺。1925年1月，史達林在涉及得莫夫卡事件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地方蘇維埃工作人員「普遍傾向於官僚作風」，「只是面向莫斯科，而不願意轉向農民」，這是「損害著全部工作」的「隱藏著」的「膿瘡」。⁷⁰史達林時

⁶⁷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04, 266, 271.

⁶⁸ 《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卷6，頁228。Сергей Селеев, “Глаза и уши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 Как 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поощряла донои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ерсантъ*, June 15, 2017,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325686> (accessed May 4, 2019).

⁶⁹ Шарап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Т. 1.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1917-1927*, с. 302.

⁷⁰ 《斯大林全集》，卷7，頁20-21。

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這番一針見血的表態，證明蘇聯高層已經認識到，基層蘇維埃工作的弊端是農村通訊員被殺事件的直接原因。

（三）組建農民協會等政治組織

農民無法通過以基層蘇維埃為代表的合法政權機構參與和影響政策制定的過程，意味著他們爭取正當權益的合法管道被堵死。為維護自身利益，很多農民便號召建立農民協會等政治組織，甚至提出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政治目標。此類願望和實踐表明農民的反抗已由恐怖行動升級為有組織、有計畫的顛覆政權的行動。只不過，這些行動因人數較少，缺乏後援，又多處於蘇聯邊遠地區，很快便遭到蘇維埃政權的取締和鎮壓。

1924 年 6 月，特維爾省別熱茨克縣（Бежецкий уезд）農民給《農民報》寫信：「為什麼……蘇維埃共和國的創建者……都企圖榨乾農民最後一滴血？……1924-1925 年的農業稅……稅額高出十幾倍甚至更多，卻仍逼著交。」寫信者抱怨全國沒有一個能保護農民利益的組織，要為建立農民協會而奮鬥。⁷¹國家政治保衛總局〈1924 年 12 月全蘇政治局勢綜述〉中專門提到，多地提出組建農民協會保護農民的想法，最典型的是莫斯科省、西部地區的斯摩倫斯克省、戈梅利省、白俄羅斯以及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省和伊爾庫茨克省。⁷²組建農民協會的案例在 1920 年代的檔案文獻中經常出現，表明此乃農民之普遍願望。

解密檔案顯示，多地農民還將此願望變為現實（後遭鎮壓）。1924 年 6 月，克里米亞一個政治軍事組織和奧德薩一個君主派組織（兩者都號召武裝起義推翻蘇維埃政權）均與克里米亞「全俄農民協會」有直接聯繫。同月，安全機關還在克里米亞取締一個名為「克里米亞農民協會指揮部」的君主派「匪

⁷¹ А. К. Соколов,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 124-125.

⁷²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65.

幫」，共有「匪徒」三百餘人。⁷³需指出，引文中的「匪幫」、「匪徒」或「土匪」等詞均為解密檔案中的用語，凸顯安全機關工作人員對這些農民持鄙視態度。實際上，他們只是試圖維護自身利益的農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洛托夫後來總結，這種「反革命組織」當時「在全蘇幾乎所有地區都有出現」。⁷⁴

農民在 1921 年之後重新要求政治上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蘇聯農村新的政治狀況，表明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在增長，對蘇維埃政權經濟上的反對正在變為政治上的反對。正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農民不僅開始意識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認識到能夠想辦法來改變自己的苦境。沒有什麼比這種意識更具革命性了。」⁷⁵顯然，「革命性」的直接表現，便是蔓延全國多地的農民反抗運動。由此可見，1924-1925 年已成為一個關鍵性節點。

（四）農民不滿情緒向軍隊蔓延

根據《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政治監控部第三分部 1924 年 3-5 月農民寄給軍隊的書信彙編》⁷⁶可知，農民不滿情緒向軍隊蔓延很廣。寄給軍隊的農民書信來自遠東、西伯利亞、烏拉爾、西北部、中央區、伏爾加河流域、烏克蘭等地區的 22 省 64 地。⁷⁷書信顯示，士兵親屬對各級政府的不滿情緒幾乎遍及全蘇。

⁷³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03, 236.

⁷⁴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 Ф.17, Оп.2, Д.148, лл.140-159. 轉引自 Ю. Н. Жуков, *Оборотная сторона НЭП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СССР.1923-1925 годы*, с. 292.

⁷⁵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頁 272。

⁷⁶ 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編制的書信彙編是俄國沿襲已久的「郵件祕密審查制度」（перлюстрация）的產物。該制度在俄國具有悠久歷史，十月革命後得以保留。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各大軍區的特別部為瞭解社會各階層的情緒，對各類居民（包括士兵）書信進行拆封、摘錄、整理、匯總、彙報。如此，數十年後，我們可從中窺見包括農民社會情緒在內的各種絕密資料。

⁷⁷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12-223. 此處的「22 省 64 地」是筆者根據檔案內容統計並計算得出的。

因為絕大多數士兵出身農民，通過書信往來獲悉老家的各種情況，所以稅收問題對在蘇軍服役的農民子弟產生巨大負面影響。

根據 1925 年上半年〈農民對北高加索軍區紅軍部隊政治精神狀況的影響報告〉，士兵對稅收制度不滿的主因是，雖然軍隊政治工作領導人向士兵承諾，一定採取措施落實政府承諾給軍屬提供的納稅優待，可最終幾乎都未兌現，導致士兵在「所有涉及政治的問題上」都不再信任政治工作領導人。⁷⁸可見，軍隊領導人公信力缺失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1925 年上半年，北高加索軍區第 22 師一士兵收到家書，得知家鄉庫圖佐夫卡村（Кутузовка）村民幾乎都因糧食稅去坐牢了。從人性和常理角度看，士兵收到此類家書肯定非常不滿，服役態度會生變。有人詰問：「你在這服役，家裡卻被搶劫，這樣的話，為何要服役？」甚至有士兵在信中請親人編造各種理由（家人死亡、分家等）申請回家，還有很多人裝病。1924 年 12 月，每天到第 37 團醫療點看病的 60-70 名士兵中，有三分之二裝病，第 84 團還有人自殘肢體，槍擊腳和眼睛。因春季到來，想休假的士兵增加幾倍。不僅如此，北高加索軍區第 8 通信團第 5 連士兵甚至說：「我恨這個政權及其法令。他們光說不做。我的妻兒在家無人照顧，他們卻不關心。」北高加索軍區第 48 營指導員詢問 30 名士兵「誰對蘇維埃政權不滿」，30 人幾乎全都舉手。⁷⁹

農民不滿情緒向蘇軍的大規模蔓延，亦是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農村新出現的政治狀況，表明軍隊的人心向背已出現問題。歷史上，很多政權的倒臺都因軍隊倒戈或叛亂。雖然此時軍隊的不滿尚停留在口頭上，但如放任不滿情緒發展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

⁷⁸ 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210, 211, 217.

⁷⁹ 本段史料均引自：С. С. Крюк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с. 211, 212, 215, 216.

(五) 「匪患」頻發

除軍隊嚴重不滿之外，「匪患」對蘇維埃國家的破壞作用也相當大。需指出，「匪患」、「匪徒」、「匪幫」均為檔案中的措辭，實際指的是暴力反抗蘇維埃政權的農民及其組織。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情報部編制的「1925 年 1-9 月蘇聯各地『匪患』分月形勢表」（表 3）可知，首先，此期內「匪患」幾乎遍及全蘇，從歐洲部分的列寧格勒軍區、西部軍區、莫斯科軍區、烏克蘭、克里米亞、伏爾加河沿岸軍區，到歐亞分界線的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再到中亞的突厥斯坦、哈薩克蘇維埃共和國，以及西伯利亞和遠東，均有「土匪」出沒；其次，各軍區或地區每月「登記匪徒總數」從數人至數千人不等（中位數是幾十人到幾百人），「匪徒」較多的有突厥斯坦、哈薩克以及烏克蘭、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

表 3 1925 年 1-9 月蘇聯各地「匪患」分月形勢表⁸⁰

地區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列寧格勒軍區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8	8	6	6	8	2	2	2	1
		登記匪徒總數	45	45	35	27	13	13	13	9	9
		清除匪徒數	19	27	25	23	2	10	9	11	11
	有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	—	—	—	—	1	1	1	—
		登記匪徒總數	—	—	—	—	—	8	8	8	—
		清除匪徒數	—	—	—	—	—	—	—	—	—
西部軍區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37	22	21	26	23	22	21	17	14
		登記匪徒總數	192	139	152	208	172	174	150	117	113
		清除匪徒數	100	78	28	95	50	44	44	72	28
	有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10	7	7	5	5	7	7	6	8
		登記匪徒總數	194	576	513	606	605	996	993	993	552
		清除匪徒數	—	—	—	—	—	—	—	—	—

⁸⁰ 該表由筆者根據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情報部〈關於 1925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蘇聯土匪運動的報告〉的附表重新繪製而成。與檔案原表相比，本表內容保持不變，但為簡便易讀，對表格形式做了調整。另外，本表標題為筆者添加，原表無標題。參見：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343-344. 原表並未解釋「無外國支持的」、「有外國支持的」之意，但從該份材料分析，此處應指有否受到「外國支持或與國外匪幫有緊密聯繫」的「匪幫」或「匪徒」。具體來說，在蘇聯西部邊境，「有外國支持的」應指得到位於波蘭的舊俄軍官支持的「匪幫」或「匪徒」；而在遠東，「有外國支持的」應指得到 1924 年 1 月阿穆爾州農民起義失敗後逃入中國境內的起義領導人及其追隨者支持的「匪幫」或「匪徒」。參見：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51, 204, 339, 341-342.1054-1055.

莫斯科軍區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14	22	17	10	14	15	12	14	13
		登記匪徒總數	70	99	96	57	71	89	104	93	81
		清除匪徒數	132	250	286	329	46	176	126	204	122
烏克蘭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25	22	18	20	25	24	22	19	23
		登記匪徒總數	190	194	150	170	200	218	223	143	193
		清除匪徒數*	546	708	708	521	939	699	583	135	427
	有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	3	—	—	2	—	2	2	—
		登記匪徒總數	—	128	—	—	21	—	5	5	—
		清除匪徒數	—	—	—	—	—	—	—	—	—
克里米亞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1	1	—	—	—	—	1	—	—
		登記匪徒總數	16	14	—	—	—	—	8	—	—
		清除匪徒數	—	—	—	—	—	—	—	—	—
北高加索軍區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131**	—	—	—	—	—	—	—	—
		登記匪徒總數	80	65	75	78	128	144	53	82	73
		清除匪徒數	32	101	50	41	36	68	184	97	217
外高加索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18	10	10	11	11	12	13	13	12
		登記匪徒總數	204	88	86	90	124	82	101	129	106
		清除匪徒數	23	21	7	3	31	19	42	35	29
	有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	8	8	9	6	6	4	4	6
		登記匪徒總數	—	94	98	84	60	78	36	36	70
		清除匪徒數	—	—	—	—	—	—	—	—	—
突厥斯坦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50	73	76	76	70	70	70	70	54
		登記匪徒總數	2,963	2,452	2,458	1,340	2,104	2,114	2,114	2,114	1,072
		清除匪徒數	82	66	93	114	150	—	—	—	261
伏爾加河沿岸軍區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17	6	13	14	18	16	14	16	16
		登記匪徒總數	119	41	90	92	121	128	122	141	141
		清除匪徒數	45	35	50	4	8	9	20	25	11
哈薩克蘇維埃共和國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13	15	22	21	25	23	24	16	21
		登記匪徒總數	173	130	303	221	581	501	523	157	236
		清除匪徒數	—	—	—	25	8	33	9	32	5
西伯利亞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24	19	10	5	8	8	5	4	6
		登記匪徒總數	698	598	144	89	166	193	161	121	94
		清除匪徒數	7	23	6	18	53	5	1	8	40
遠東軍區	無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28	20	17	18	20	21	25	27	20
		登記匪徒總數	416	316	1601	474	211	377	481	629	317
		清除匪徒數	53	27	13	9	28	11	11	109	17
	有外國支持的	登記匪幫數	21	15	10	8	13	11	11	13	11
		登記匪徒總數	1,059	378	505	485	953	416	456	646	548
清除匪徒數	—	—	—	—	—	—	—	—	—	—	

資料來源：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343-344.

說明：* 本表中，遭清除的匪徒數量除「登記」匪幫中的匪徒外，還包括純粹刑事性質的小匪幫。這可能是此處烏克蘭「清除匪徒數」多於當月「匪徒總數」的原因。

** 檔案中的該數字辨認不清，數字「131」明顯不合理。

位於中亞的突厥斯坦和哈薩克蘇維埃共和國的匪徒數量之所以在全國位居前列，當然與蔓延當地的著名的巴斯馬奇運動有關。它始於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延續到 1930 年代初，是一場有組織的以反抗蘇維埃政權、趕走布爾什維克為目標的武裝運動。主要參加者是穆斯林農牧民，參與人數最多時（1920 年）高達 15 萬人。「巴斯馬奇」在突厥語中意為「匪徒」、「襲擊」。穆斯林農牧民反抗者的鬥爭策略是，依靠山地和沙漠的有利地形，採取游擊戰術，用騎兵對共產黨員、政委、蘇維埃領導人和政權的支持者進行突然襲擊，但避免與紅軍常規部隊進行大規模的正面作戰。⁸¹因此，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巴斯馬奇運動非常頭疼。

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上報給國家領導人的〈關於 1925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蘇聯土匪運動的報告〉，將「土匪」運動的性質分為「刑事性」和「政治性」，認為「純粹的刑事性匪患對於中央區、烏克蘭左岸區、伏爾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非常典型」，而「政治性匪患的中心在邊疆地區——西部、烏克蘭、遠東軍區，且多數都有外國支持或與國外匪幫有緊密聯繫」。⁸²其中，西部和遠東地區的「匪幫」分別得到波蘭和中國境內勢力的支持。⁸³政治性「匪幫」發動的攻擊次數不少：1925 年 1-9 月西部地區「匪幫」共搶劫 115 次，烏克蘭「匪幫」也搶劫了 862 次。⁸⁴所謂「搶劫」，從解密檔案來看，多為破壞交

⁸¹ А. М. Плеханов, «Басмачество,» https://bigenc.ru/domestic_history/text/1863940? (accessed August 26, 2021).

⁸²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339, 341-342.

⁸³ 據檔案記載，「波蘇邊界波蘭一側……有匪徒在活動，大多數為舊俄軍官」；而中蘇邊界中方一側的「匪徒」則為 1924 年 1 月阿穆爾州農民起義失敗後逃入中國境內的起義領導人及其追隨者。參見：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51, 204, 1054-1055. 筆者在檔案中並未發現烏克蘭「匪幫」獲得何鄰國支持的材料。不過，從歷史上看，有可能支持烏克蘭「匪幫」的有波蘭、土耳其等鄰國。波蘭可能支持烏克蘭「匪幫」的原因顯而易見，近代以來俄、波兩國乃宿敵，不斷發生領土糾紛和戰爭（如十七世紀初波蘭侵略俄國、十八世紀後半期俄國三次瓜分波蘭、1919-1920 年的蘇波戰爭等），主要爭奪對象便包括烏克蘭；土耳其可能支持烏克蘭「匪幫」的原因也因俄、土兩國在十七至二十世紀共爆發過 12 次戰爭，主要爭奪對象便是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半島。

⁸⁴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341-342.

通設施、襲擊蘇維埃、郵局、合作社及其他企業和機關單位等。

邊疆地區的政治性匪患對國家穩定的潛在威脅非常大。在蘇聯高層看來，如果國外敵對勢力與邊疆的政治性匪幫聯合起來，發動農民運動，會造成不可預測的後果。1924 年 7 月 9 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局長捷爾任斯基在給史達林的報告中不無擔心地說：「因東南部糧食歉收，白衛分子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都寄希望於大規模農民反蘇運動，希望影響紅軍部隊。……他們的老巢有：伏爾加河流域的薩拉托夫省、東南部的頓河州和庫班州、烏克蘭、克里米亞、遠東軍區等地。」⁸⁵三年前以失敗告終的蘇波戰爭仍讓布爾什維克心有餘悸，在此情況下，蘇聯高層對邊疆地區發生戰爭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

最終，因人數和規模較小，蘇聯境內的大多數「匪徒」均被消滅。解密檔案記載，僅 1925 年前 9 個月，全國就清除了 10,352 名「匪徒」，其中打死 985 人、打傷 133 人、抓捕 8,636 人、投降 582 人、槍斃 16 人。截至 1925 年 10 月 1 日，全國尚有積極活動的「匪幫」194 個，「匪徒」2,435 人。⁸⁶

（六）農民武裝暴動

據檔案記載，蘇維埃政權在糧食收成極糟的情況下仍大幅提高稅額，招致農民武裝暴動。1924 年 1 月，遠東的後貝加爾斯克州和阿穆爾州先後爆發武裝起義。千餘農民參加阿穆爾州的起義，推翻了村鄉兩級政權機關，組建軍隊，宣告成立「阿穆爾臨時政府」。同年 6 月，克里米亞半島一組織準備發動起義，後遭取締。該組織規模較大，至少有 400 人，組織結構合理，軍事素養高，與烏克蘭和俄聯邦共和國東南地區的同類組織有聯繫，足以提供克里米亞敵對武裝勢力的登陸部隊實際協助。此外，奧德薩、庫班和北高加索也有類似組織。例如，1925 年 4 月 30 日晚，庫班地區離克拉斯諾達爾（Краснодар）不遠的

⁸⁵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23-224.

⁸⁶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338, 339.

普拉季尼鎮（станция Платинировская）附近，發生一起三百餘位農民參與的武裝暴動。⁸⁷

1924 年 8 月底 9 月初，喬治亞爆發了一場由孟什維克領導、旨在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武裝起義，但很快即遭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部隊鎮壓。大陸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場爭取民族獨立的起義，不能被簡單定性為農民反抗蘇維埃政權的行動。然而，筆者研究相關材料後，發現喬治亞起義恰恰是農民不滿情緒的爆發。

解密檔案顯示，1924 年春夏喬治亞絕大多數農民的境況都很困難。因種子、農具和役畜短缺，旱災和蟲害嚴重，有的地方（如阿布哈茲各縣）播種面積比往年減少 15%-35%，最嚴重的甚至減少 40%-50%。不但日用必需品和農具短缺，獸疫流行，且缺糧嚴重，個別地區甚至出現饑荒。因此，農民對稅務局非常不滿。4 月，位於喬治亞西北部的上斯瓦涅季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具有挑釁性，拒絕承擔任何勞役和捐稅，繼續「盜匪」活動。警察逮捕他們時，卻被繳械並遭毆打。內務人民委員部請喬治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調入軍隊作戰，以解除農民武裝。⁸⁸可見，1924 年春，惡劣的生存狀況已讓天性暴烈的喬治亞農民憤而反抗執政者。8 月底 9 月初的喬治亞起義標誌著農民不滿情緒的爆發。

另外，1924 年 10 月 27 日，俄共（布）中央全會通過一份〈關於喬治亞問題的決議〉。其中提到，喬治亞的全部 25 縣中，完全被捲入的只有兩縣，部分被捲入的有三縣（每縣均有數千農民參與）。然而，完全被捲入的兩縣——古里亞縣（Гурия）和謝納基縣（Сенакский уезд），尤其是前者——幾乎所有農民都參加了起義。這是因為古里亞縣屬貧困地區，以前富餘男勞力常到黑海港口城市打工補貼家用，可是 1921 年春喬治亞建立蘇維埃政權後，因與外

⁸⁷ 本段史料均引自：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03-204, 202-203, 302.

⁸⁸ 本段史料均引自：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41-244.

國商貿聯繫萎縮，該縣農民經濟狀況便急劇惡化。1924 年農業稅稅率的大幅提高導致該縣農民更不堪負荷。在此形勢下，孟什維克黨的「喬治亞獨立」、「擺脫蘇維埃政權的統治」等「蠱惑性」口號，的確會對參加起義的農民積極分子施加較大影響。⁸⁹所以，雖然起義領導者提出了民族獨立的口號，但是與蘇聯其他地方的農民一樣，喬治亞農民參加起義主要還是出於經濟原因。

爲證明喬治亞起義的主因並非因爲民族壓迫，筆者專門查閱了 1924 年 9 月至 1925 年的《斯大林全集》。喬治亞起義後，史達林在涉及起義問題的歷次發言或講話中，隻字不提起義原因是「民族問題」，反而大談起義原因是「工農產品價格」問題，是共產黨未覺察到農民不滿情緒。例如，1924 年 10 月 26 日，史達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的演說中提到，喬治亞農民起義，特別是古里亞縣起義「無疑是具有群眾性的」，起義的經濟基礎是，蘇維埃政權的價格政策「使農民感到困難」，因而農民想要爭取「廉價的商品和提高玉蜀黍的價格」。⁹⁰史達林提及的起義原因，與前文提到的〈關於喬治亞問題的決議〉對起義原因的解釋如出一轍。

根據莫洛托夫的說法，農民起義參與者最多的古里亞縣之所以引起蘇維埃政權高層的特別關注，還因爲該縣的共產黨員人數（約一千人）不但在喬治亞各縣中，而且在全蘇各縣中都是最多的。共產黨員人數最多，同時參與起義的農民人數也最多，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來說，這一矛盾狀況非常令人意外。莫洛托夫指出，「這不但是喬治亞的缺點，而且是對全黨都具有重大意義的缺點」。⁹¹

起義一個月後，史達林總結道：正是「由於共產黨和群眾的聯繫很差，孟什維克得以引誘一部分農民群眾參加暴動」，所以「問題的關鍵」是農民「不

⁸⁹ Л. С. Гагагова, Л. П. Кошелева, Л. А. Роговая,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Кн. 1. 1918-1933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с. 248; Ю. Н. Жуков, *Оборотная сторона НЭП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СССР. 1923-1925 годы*, с. 291.

⁹⁰ 《斯大林全集》，卷 6，頁 273-275。

⁹¹ 本段史料均引自：Ю. Н. Жуков, *Оборотная сторона НЭП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СССР. 1923-1925 годы*, с. 291.

滿情緒」的「積累」。⁹²這表明，喬治亞起義讓蘇聯高層醒悟，意識到再不調整政策可能會威脅到政權穩固。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過：「對政治體制來說，……農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農民既能起著極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著高度的革命作用。」⁹³這對當時的蘇聯而言可謂再正確不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喬治亞起義標誌著 1924-1925 年蘇聯農村危機的形成。

有學者認為，1924-1925 年反抗蘇維埃政權的農民人數過少，所以「恐怖行動」、軍隊不滿情緒、「土匪」運動和武裝暴動等反抗運動並非農村「危機」的表現。的確，農民反抗運動的參與人數的確比內戰時期的農民起義隊伍（動輒數萬人）少得多。然而，需強調的是，1924-1925 年屬和平建設時期，內戰硝煙早已散去多年。將此時期的「匪徒」數量與內戰時期的農民起義人數進行簡單對比，於情於理都是不合適的。俄國老百姓從 1914 年起就被迫捲入長達七年的血腥戰爭（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 1918-1921 年的國內戰爭），農民早已厭倦了戰爭，所以除非萬不得已或忍無可忍，他們絕不會暴力反抗當政者。這也限制了參與反抗鬥爭的農民人數。然而，在和平時期，即便反抗人數很少，執政者也不敢忽視。對布爾什維克來說，這更是不可容忍的，因為它標誌著執政黨全面控制社會企圖的失敗。

綜上所述，1924-1925 年間，蘇聯農村局部地區出現了各種危機現象。由於「政治性匪患」和武裝暴動幾乎都發生於邊疆地區，且有國外敵對勢力對「匪徒」或起義人員的支持或援助，所以蘇聯高層擔心，在外國支援下，邊疆地區的農民暴動若成功，很可能演變為侵蘇戰爭，進而推翻蘇維埃政權。這種潛在的威脅是高層決定調整政策的重要原因。1925 年底，在聯共（布）⁹⁴十四大上，史達林用比較模糊的語言說明某種威脅確實存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們農村中的情況，你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當時，在農民中間普遍的不滿情緒增

⁹² 這是史達林 1924 年 10 月 22 日在俄共（布）中央召開的農村支部書記會議上的演說。參見《斯大林全集》，卷 6，頁 267-268。

⁹³ 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頁 267。

⁹⁴ 1925 年 12 月，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更名為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

長起來了，某些地方甚至企圖舉行暴動。正是這些情況決定了黨在農村中的新方針。」⁹⁵

四、蘇聯政府的政策調整與農村危機的消解⁹⁶

解密檔案顯示，黨內高層人士曾多次提及政治局勢可能惡化，並建議國家及時採取措施。1924 年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局長捷爾任斯基在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指出：「要讓農民知道，他們不只是國家的主要納稅人，國家機器的永恆的資金來源；要切實讓農民知道，他們也是政府關注的對象，政府準備為援助和恢復農民經濟做出巨大犧牲。」同年 7 月 9 日，捷爾任斯基在給政治局的另一份報告中認為，農民處境是當時的主要問題，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改變農村政策。⁹⁷

蘇聯高層對三年前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亂和席捲全國的農民暴動仍心有餘悸，對軍隊與農村的反抗特別敏感，也十分警惕。因此，喬治亞起義必然引起蘇聯高層震動並在政策上做出相應調整。1924 年 10 月至 1925 年初，史達

⁹⁵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267-268。

⁹⁶ 在展開論述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本節使用的史料。筆者依據的史料，除史達林言論外，最主要的便是官方文獻，如執政黨、政府和蘇維埃的決議等，而沒有採用除史達林外其他領導人的言論。具體原因如下：

第一，史達林個人的觀點最重要。蘇聯當時已經形成一黨獨裁、黨內一人專斷的政治體制，除最高領袖之外，其他領導人的言論對於政策最終形成的作用不大。列寧去世後的 1924-1925 年屬於蘇聯高層黨內權力鬥爭的關鍵期，由於史達林佔據黨總書記的有利職位，實際上主持黨中央日常事務和幹部任命，所以他實際上能夠左右黨和國家政策。而其他領導人的觀點或言論，對於政策的調整來說，重要性並不大。只是因為當時史達林還沒有取得黨內權鬥的最終勝利，所以他制定政策時需考慮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便是：是否有利於鞏固自身權力。第二，筆者並未採用其他黨內領導人的言論，即使觀點與史達林相同或類似。因為他們的觀點僅僅只是黨內鬥爭時期的觀點而已，如果史達林不贊同或對鞏固史達林權力無益，無法成為黨和國家的官方政策。

第三，在 1924-1925 年的黨內鬥爭時期，我們需要區分理論觀點的分歧或一致，與政府實際實施的政策之間的區別。當時的蘇聯政壇尚未形成後來的一言堂，可以就不同觀點進行爭論，但是實際政策的制定主要取決於史達林的意志。

⁹⁷ 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05-206, 226.

林涉及喬治亞事件的一系列講話絕非空穴來風。1924年10月，史達林強調，應當「把格魯吉亞〔喬治亞，下同〕事件當作前車之鑒」，「給農民勞動群眾的政治積極性開闢一條出路」，否則「俄國各地都會重演格魯吉亞發生過的事件」。1925年1月，他再次強調：「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新的唐波夫暴動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亂決不是沒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魯吉亞暴動提出了一個嚴重的警告。」⁹⁸應當說，蘇聯高層對時局的判斷非常準確。他們及時關注農民的對立情緒和行動，為遏止危機的蔓延，決定大幅調整農村政策。由是觀之，喬治亞武裝起義是促成農村政策發生轉折的重要事件。

（一）政治上：面向農村

1924年10月25-27日召開的俄共（布）中央全會決定：首先，給農民提供更多的政治權利，不但增加非黨農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代表名額，而且吸收農民到省級各機關工作，甚至擔任鄉、縣乃至省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其次，要求中央和地方機關「真正關懷和注意廣大農民群眾的需求、需要和情緒」。⁹⁹這次全會標誌著蘇維埃政權實施「面向農村」方針的開始。

「面向農村」方針的提出，與執政黨觀察到的農村現實情況有關，正如1925年6月9日史達林所言：「一方面是管理者的無人監督、獨斷獨行和任意橫行，另一方面是農村中的不滿和抱怨。」史達林指出，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在於「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農村工作方法」，其根源是農村蘇維埃領導人團體的唯上思維：「農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縣裡看，而很少朝下看，朝農村居民看，他們覺得自己不是對農村負責，不是對選民負責，而是對縣和省負責。」¹⁰⁰正因如此，黨中央才提出「面向農村」的口號，希望以此來糾正基層黨政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做法。

⁹⁸ 《斯大林全集》，卷6，頁267-268；卷7，頁23。

⁹⁹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二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521、522。

¹⁰⁰ 《斯大林全集》，卷7，頁153。

1. 鞏固工農聯盟

1925 年 4 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開誠布公地指出，「農村中的戰時共產主義殘餘」，無論在經濟工作方面或政治行政工作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利益的某種矛盾」的「尖銳化」，進而導致工農聯盟出現裂隙，但黨的代表會議同時認為，「在國家大力援助全體基本農民群眾恢復農業的條件下，這些矛盾並不是不可調和的」。¹⁰¹

那麼，具體應該如何調整呢？史達林明確指出，必須進行「自我批評」，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人民掩蓋真相的政黨，害怕陽光和批評的政黨，……是一個註定要滅亡的騙子集團。」¹⁰²經歷農村危機之後，史達林開始反思執政之路上的歷史教訓。與 1924 年相比，1925 年的史達林對工農聯盟的重視程度明顯增加。這從《斯大林全集》收錄的文章和講話提及「工農聯盟」的頻次便可看到。他 1924 年全年只有 7 次提及「工農聯盟」，而 1925 年卻 16 次提及「工農聯盟」，四十餘次提及（工農、城鄉）「結合」。1925 年 1 月，史達林從理論高度闡述了工農聯盟的重要性：「在無產階級現有的一切基本同盟者中間」，農民是「立刻可以給我們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所以蘇維埃政權必須「竭力……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狀況，……改善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¹⁰³5 月，他再次指出，雖然「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存在著某些矛盾」，但是，由於兩者之間「在發展的根本問題上還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工農聯盟肯定可以得到鞏固。¹⁰⁴

¹⁰¹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下略），《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 3。

¹⁰²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103。史達林此處的講話除了是針對農村危機的表態之外，也可被解讀為是在批評當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的「新反對派」。在成王敗寇的黨內鬥爭中，利用一切機會對政敵進行抨擊，是在政治上打擊對手的必要手段。

¹⁰³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25、28-29。

¹⁰⁴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92。

2. 活躍蘇維埃

針對基層蘇維埃工作人員經常遭遇恐怖襲擊的危險狀況，以及農民政治積極性增長，要求組建農民協會的現實情況，蘇維埃政權提出「活躍蘇維埃」的方針。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

首先，改變農村中舊的行政管理方式。1925 年 5 月 9 日，史達林批評了「在黨內和國家機關內實行最大限度的壓制政策」的弊端，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和有致命危險的」，蘇維埃政權需要的是「在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方面的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只有這樣，黨才能「掌住舵」；在提到黨在農村的具體任務時，史達林指出：「農民的政治積極性要求改變農村中舊的領導方法」，「放棄畸形的行政管理方式」，「決不能只對農民發號施令」，「應當學會耐心地向農民解釋他們所不瞭解的問題，應當學會說服農民」。¹⁰⁵

其次，吸納農民參與蘇維埃及其周圍組織。1925 年 4 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提出，必須「真正大量地提拔非黨的男女農民去擔任蘇維埃和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合作社和其他機關（村的、縣的、省的、共和國的機關）的負責工作，同時正確地經常地提拔農村中最優秀的黨員去擔任蘇維埃（和合作社）的工作，並從城市中派遣有修養的工作人員去盡力加強這方面的力量。」¹⁰⁶5 月 9 日，史達林指出，黨在農村的具體任務是，必須使農民的政治積極性「以蘇維埃的形式表現出來，使這種積極性通過蘇維埃，而不是繞過蘇維埃」。¹⁰⁷6 月 9 日，史達林又說：「必需善於把由於工人和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增長而湧現出來的這兩個階級當中的優秀人物吸收到黨內來。」¹⁰⁸他要求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參與到「吸收農民參加村、鄉、區、縣的管理工作」中，向農民解釋「黨和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政策」；他認為，不這樣做就「休想取

¹⁰⁵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104、107-108。

¹⁰⁶ 《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頁 6。

¹⁰⁷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108。

¹⁰⁸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142。

得農民的信任」。¹⁰⁹史達林隨後指出，活躍在基層黨組織和蘇維埃機關周圍的千百萬非黨工農群眾自發組織，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國家的領導和管理極其重要；這些組織可以逐步消除國家機關同人民之間的「壁壘」。¹¹⁰1925 年春夏之際，史達林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必須活躍蘇維埃，這種認識的得出顯然與剛剛經歷過的那場農村危機的教訓有關。

3. 避免使用鎮壓措施

針對「採取大規模鎮壓措施」這一造成農民反抗運動的主因，蘇維埃政權決定實施變革。1925 年 6 月 9 日史達林強調：「現在按照軍事方式進行領導已經不行了」，「對工人和農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須有特殊的敏感」。針對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工農矛盾，史達林特別強調，絕對不能「挑起階級鬥爭」，而只能「用協商和互相讓步的方法來調節這一鬥爭，並且無論如何不要把它導向尖銳化的形式，導向衝突」。針對軍隊不滿情緒，史達林指出：「新方針只會改善工作，……在農村中確立蘇維埃民主制只會改善紅軍的狀況，把紅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因為我們的軍隊主要是農民。」¹¹¹可見，史達林對農民反抗運動非常「敏感」，反復強調要「協商」和「讓步」，不能挑起「階級鬥爭」。避免使用鎮壓措施對於農村危機的消解肯定起了正面作用。

（二）經濟上：減輕稅負

作為一項政治方面的舉措，「面向農村」的具體措施主要是「工農結合」，即城市「支援」農村——給農民「獻旗」、作報告，捐贈報刊、雜誌、書籍等。農民書信中充斥著類似事例。¹¹²從政策實施效果看，這些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工農關係和社會緊張氛圍，但因多數措施屬於做表面文章，從農民書信和解密檔案可見，自 1924 年 10 月至 1925 年春，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稅收政

¹⁰⁹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68。

¹¹⁰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135-136。

¹¹¹ 《斯大林全集》，卷 7，頁 142、147-148、155-156。

¹¹² 類似事例可見：A. K. Соколов,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 117-124.

策的敵視幾乎從未停止。¹¹³這是因為，這些支援措施大都集中於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而農民非常看重實際利益，僅在政治上對農民進行妥協和讓步是不夠的，還需有經濟上的實際措施。關於這一點，史達林早在 1924 年 5 月就在俄共（布）十三大的報告中指出，農村工作人員的「錯誤」在於，「只想從口頭鼓動方面去接近農民」，卻不了解農民需要的是「提供直接利益的鼓動」。¹¹⁴

稅收政策的重要轉捩點是 1925 年 4 月下旬召開的俄共（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會議。4 月 27 日，大會通過決議，將 1925-1926 年度單一農業稅總額從 4.7 億盧布減為 2.8 億，並從單一農業稅收入項下撥出 1 億盧布給鄉預算，要求鄉政府應該把這些資金用於滿足同當地農民有直接關係的需要（學校、醫院、當地的道路等等）。¹¹⁵5 月 20 日，執政黨的決定就成為蘇聯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且規定禁止向農民徵收任何非法的地方附加稅。¹¹⁶1925-1926 年度全國農業稅實際徵收額，比代表會議確定的 2.8 億盧布還少，只有 2.5 億盧布。¹¹⁷可見蘇聯政府調整政策的執行力度之大。

表 4 每戶農民的直接稅和間接稅稅負變化 (%)

年度	1912	1921-1922	1922-1923	1923-1924	1924-1925	1925-1926
稅負	100	97	78	60	68	44

資料來源及說明：*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с. 60. 此表是筆者根據材料內容繪製而成。

¹¹³ 此段時間內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敵視，農民書信請見：А. Я. Лившин, И. Б. Орлов, *Письма во власть. 1917-1927. Заявления, жалобы, доносы, письм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м вождям*, с. 379-381, 400-404, 407-408, 411-419; 安全機關的解密檔案請見：А. Берелович,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55-260, 263-270, 271-287, 288-302.

¹¹⁴ 《斯大林全集》，卷 6，頁 184。

¹¹⁵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с. 61-62.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譯（下略），《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一卷（1917 年—1928 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頁 513。

¹¹⁶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一卷（1917 年—1928 年）》，頁 495-496、513、522。

¹¹⁷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и др., *Финансов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497-498.

除農業稅外，農民承擔的其他稅收也減少了。1925 年 4 月，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瞿魯巴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列舉了 1921-1922 年度至 1925-1926 年度全蘇每戶農民承擔的直接稅和間接稅數額的變化，從中可窺見本文論及的時間段內農民平均稅負的突然上升和下降。以 1912 年為 100，可見 1921 年新經濟政策開始之後，每戶農民的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數額不斷下降，但在 1924-1925 年度突然提高了 8%；隨著政策的調整，1925-1926 年度農民稅負再次迅速下降了 24%。

除稅額降低外，蘇聯政府還調整了徵稅方法。首先，針對當年應徵稅額公布太晚的弊端，政府決定：不是取當年收成數，而是取三年平均收成數，取兩年的平均價格。這樣，就可於春天的 4 月底或 5 月初公布稅率，而不是以往遭人詬病的秋天。這種安排可以讓農民在春天播種時便知道他應繳納的稅額，可依稅額確定播種計畫。其次，針對牲畜徵稅的缺點，政府不但提高了應稅牲畜的年齡，而且改變了以前牲畜與耕地面積換算的全國統一係數（0.76），在不同地區實行不同係數，總體而言換算係數得以降低。¹¹⁸最後，廢除對欠稅者採取的罰款、逮捕、拍賣財產和其他行政處分。¹¹⁹這樣，前文提及的農業稅三大弊端（牲畜徵稅、當年應徵額公布時間太晚、稅負過重），以及導致農民在政治上對抗蘇維埃政權的稅收弊端（罰款、逮捕等），幾乎都被革除。

此外，導致軍隊對蘇維埃政權不滿的另一稅收弊端（不給軍屬納稅優待）也遭廢除。1925 年 5 月 20 日，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必須準確及時地向納稅農民提供法律上規定的優待。」¹²⁰根據瞿魯巴提供的數字，各種法令給各種類別的貧農和紅軍士兵分別減免了 100%、50%、25%、10% 的應繳稅額，1923-1924 年有 595.2 萬農戶獲得了各種納稅優待和減免。¹²¹

¹¹⁸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с. 64-65.*

¹¹⁹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一卷（1917 年—1928 年）》，頁 496-497。

¹²⁰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一卷（1917 年—1928 年）》，頁 522。

¹²¹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с. 76.*

除減輕稅負外，蘇維埃政權還給農民提供了各種援助。1925 年 9 月 17 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作出決議，給農民提供農具和農業機械，向農民提供貸款以購買牲畜、進行土壤改良工作、改善農業技術水準，並為此目的撥款 2,500 萬盧布。¹²²另外，為減輕農民經營困難，蘇維埃政權還在土地政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改變。1925 年 5 月 20 日通過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廢除了農民大規模出租土地方面的限制，規定在多圃制下出租時間不超過兩個輪作週期，在三圃制和四圃制下不超過 12 年；個別情況下甚至允許將國家儲備土地以 12 年以上的期限出租給單獨的使用者。¹²³

為了從組織上領導農村正在進行的政策調整，1925 年 12 月聯共（布）十四大通過決議，強調「最近時期各級黨組織最重要的任務是：切實貫徹黨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還要求「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察院的各機關在明年必須負責進行檢查下級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的工作，著重檢查它們是否領會上級黨機關決議的精神，並將檢查委員會長期派往農村。」¹²⁴對與農村有關係的黨政機關進行檢查，是從組織上保障黨在農村的新方針能夠順利執行的重要一環。

（三）農村危機的消解

蘇聯政府除通過減輕稅負來保障農民的自我積累，以提高農民勞動興趣、改善生產經營之外，還鼓勵土地租賃，在嚴格維護雇工利益的前提下降低雇工條件，甚至規定可以在租種的土地上雇工。¹²⁵同時，還加強銀行支農信貸，鞏固合作社，擴展農村商業關係，改善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這些措施顯然是新經濟政策在農村的深化，對提高農民勞動積極性，改善執政黨與農民的關係，產生了積極作用，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¹²² Ю. А. Поляков, *Переход к нэпу и сов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7), с. 471.

¹²³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一卷（1917 年—1928 年）》，頁 514。

¹²⁴ 《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頁 94。

¹²⁵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一卷（1917 年—1928 年）》，頁 514。

從共產黨的官方文件可知，政策調整很快獲得成功。1925 年 10 月初，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在〈告俄共（布）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書〉中提到，國民經濟正在「蓬勃發展」，不僅工業基礎「大大地鞏固了」，而且農業的發展也在「高漲」；中央委員會強調，農業的高漲是由「黨和蘇維埃政權所實行的政策促成的」，由於「今年的豐收」，農業也「走上加速發展生產力的道路」，不但惠及「農村富裕上層」，還遍及「廣大的中農群眾」。¹²⁶

農民生產勞動積極性得到很大提高，主要表現為農作物播種面積不斷增長。1924 年全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為 9,810 萬公頃，1927 年猛增至 11,240 萬公頃，增速為 14.6%。¹²⁷播種面積的增長，再加上老天的眷顧，以及農民忘我的勞動，使得蘇聯糧食總產量突飛猛進。五種主要糧食作物（小麥、黑麥、大麥、燕麥、玉米）的總產量，1924 年為 4,750 萬噸，1925 年增至 6,560 萬噸（比上年增長 38.1%），1926 年更達 7,190 萬噸（比上年增長 9.6%）。¹²⁸從 1926 年至 1928 年，蘇聯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 2.5%。¹²⁹農業如此平穩、持續地逐年增長，在整個蘇聯歷史上都是少有的。

結 語

1920 年代中期的蘇聯，雖然沒有經歷類似 1920 年代初期和 1930 年代初期的血腥鬥爭、社會動亂和大規模饑荒，但也遠非人民能夠休養生息、享受和平生活並品嚐幸福滋味的繁榮昌盛之國。一系列主客觀因素導致 1924-1925 年蘇聯在新經濟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局部性的農村危機。概言之，這場危機爆發的因素有 1924-1925 年的歉收和饑荒、農業稅負過重等。

¹²⁶ 《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頁 69。

¹²⁷ 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彙編》，頁 89。

¹²⁸ 米切爾（B. R. Mitchell）編，賀力平譯，《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歐洲卷：1750-1993 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頁 312。五種主要糧食作物各年的總產量及增長率，乃筆者根據書中資料計算得出。

¹²⁹ 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彙編》，頁 89。2.5%是筆者根據書中數據計算得出的。

農村危機最終之所以能消解，與蘇維埃政權部分滿足了農民的政治訴求和經濟訴求密切相關。農民的經濟訴求主要有減輕稅負、免除牲畜徵稅、固定時間公布應徵稅額、給軍屬提供納稅優待等，這些訴求基本都得到了滿足。農民的政治訴求主要有避免使用強制和暴力措施、建立農民協會、農民應與工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即提高代表大會中農民代表的比例）等，這些訴求僅前者得到了滿足。

蘇聯政府之所以不允許農民建立「農民協會」這一保護自身利益的組織，明顯與該組織的政治目標（推翻蘇維埃政權）相關。蘇聯政府未提高代表大會中農民代表比例的原因，與執政黨對農民的基本認識和階級定位有關。史達林認為農民屬小私有者，是應該被改造和消滅的階級，所以要繼續削弱農民的影響，仍保持代表大會上農民代表與工人代表比例嚴重失衡的政策。

蘇聯政府對農民讓步、協商的政策調整其實只持續了兩、三年時間。熟悉蘇聯歷史的人都知道，史達林 1924-1925 年間處理農村危機時的一些文章和講話，與後來眾所周知的史達林形象有很大差異。在 1927 年 12 月聯共（布）十五大上基本取得黨內鬥爭勝利的史達林，在應對下一場危機（1927-1928 年的糧食收購危機）時，採取的措施已不是向農民讓步和妥協，而是截然相反。史達林採取的恰恰是曾被他激烈批評過的托洛斯基派的主張，不僅完全恢復對農民的強制和剝奪手段，甚至更為激烈和殘酷，後果也更為嚴重。在農業全盤集體化（1929-1933）過程中，個體農民階層消失了，富農不但被剝奪財產，還遭流放至極北地區或西伯利亞等邊遠地區。

非常弔詭的是，既然蘇維埃政權解決 1924-1925 年農村危機的政策和手段如此有效，為何僅兩、三年後就放棄了？為何 1929 年史達林甚至放棄了曾經支持的新經濟政策，轉而實施農業全盤集體化？欲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圍繞激烈的黨內鬥爭問題、高層對新經濟政策的態度問題、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問題，以及對農民和農業的基本態度等問題，進行綜合分析。

首先，蘇聯政府解決 1924-1925 年農村危機的手段和方法，其實只是一種見機行事的權宜之計，是史達林為在黨內鬥爭中打壓政敵使用的政治策略。1924 年 1 月列寧去世後，黨內各派權力鬥爭日趨激烈。為在權鬥中獲得優勢，各派紛紛在理論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論，以確立己方的優勢政治地位。屬托洛斯基派的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托洛斯基一道主張用犧牲農民的方法來積累工業化資金。在 1924 年的黨內鬥爭中，史達林聯合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構成所謂「三駕馬車」，批判和反對托洛斯基。「三駕馬車」將托洛斯基這個當時最大的政敵扳倒，在理論上攻擊托洛斯基是「農民之敵」。所以，為了在與托洛斯基派的黨內鬥爭中取勝，採取與托洛斯基派觀點相反的做法，有其內在的邏輯自洽性。¹³⁰1925 年初，托洛斯基在黨內鬥爭中暫時落敗（標誌性事件是 1925 年 1 月他失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之後，史達林在黨內鬥爭中的主要敵人變成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的「新反對派」。為在黨內鬥爭中獲勝，史達林運用高超的政治手腕，聯合布哈林和李可夫，與「新反對派」進行論戰。此時期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是工農聯盟的堅定支持者。所以，為了打倒「新反對派」，史達林在 1925 年採取與布哈林和李可夫等盟友相同或相似的觀點，也有合理性。1929 年史達林打倒主要政敵、真正成為全黨領袖之後，他將當年「見機行事的權宜之計」統統推翻。

其次，布爾什維克全黨上下從最開始便沒將新經濟政策作為一項應長期施行的政策。因為新經濟政策是被迫採取的臨時性政策，具有應急性和實驗性。如若長期堅持新經濟政策，還必須改變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例如，可否有商品、市場、雇傭勞動等）。另外，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後，問題與成效並存，成效更多地體現在經濟方面（如糧食產量的增長、工業的恢復等），而問題則更多地體現在政治方面（如雇傭勞動、耐普曼和農村富農問題等）。如果領導人看重經濟方面，往往會堅持新經濟政策，而如果領導人看重的是政治方面，則很可

¹³⁰ 俄羅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茹科夫（Ю. Н. Жуков）也認為，1923-1925 年蘇聯的各種經濟問題都與當時的黨內鬥爭有關。參見 Ю. Н. Жуков, *Оборотная сторона НЭП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СССР. 1923-1925 годы*, с. 3-440.

能會放棄新經濟政策。面臨 1924-1925 年農村危機之際，黨內高層看重的是經濟問題，因而實施的是緩和矛盾的政策；而面臨 1927 年底 1928 年初的糧食收購危機之時，黨內高層更看重的卻是政治問題，因此實施了消滅富農階級和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政策。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書信集

Крюкова, С. С.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20-х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Лившин, А. Я., И. Б. Орлов. *Письма во власть. 1917-1927. Заявления, жалобы, доносы, письм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м вождям*.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Соколов, А. К.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7.

檔案集

Берелович, А., В. Дани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 2. 1923-192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Гагагова, Л. С., Л. П. Кошелева, Л. А. Роговая.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Кн. 1. 1918-1933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會議速記紀錄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統計文獻

米切爾 (B. R. Mitchell) 編，賀力平譯，《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歐洲卷：1750-1993 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彙編》，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Вейцер, И. Я. *Ежегодник хлебной торговли №1. 1925/26 и 1926/27 гг. Часть 2. Таблиц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ркомторга СССР и РСФСР, 1928.

Сектор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ЦСУ СССР. Основные элементы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ССР 1916 и 1923-1927 гг. Москва: СТАТГОСИЗДАТ ЦСУ СССР, 1930.

言論彙編

《斯大林全集》，卷 6，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斯大林全集》，卷 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斯大林全集》，卷 1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李可夫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全集》，卷 4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張曉山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農業、農村和農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決議彙編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二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一卷（1917 年—1928 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

二、專著

- 伊薩克·多伊徹 (Isaac Deutscher) 著，周任辛譯，《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向祖文，《蘇聯經濟思想史——從列寧、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 沈志華，《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黃立芾等，《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 葉·阿·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著，紀濤、蔡愷民譯：《新經濟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 Barnett, Vincent. *The Revolutionary Russian Economy, 1890-1940. Ideas, Debates and Alterna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Hudson, H. D., Jr. *Peasants, Political Police, and the Early Soviet State: Surveillance and Accommodation under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Андреев, Е. М., Л. Е. Дарский, Т. Л. Харькова, *Насе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22-199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 Голанд, Ю. М. *Кризисы, разрушившие НЭП.* Москва: МНИИПУ, 1991.

- Жуков, Ю. Н. *Оборотная сторона НЭП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СССР. 1923-1925 го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ва-Терм», 2014.
- Климин, 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21-1927)*.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
- Поляков, Ю. А. *Переход к нэпу и сов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7.
-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 Я. и др. *Финансов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торое издание.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7.
- Шарап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Т. 1.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1917-1927*.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三、論文及專文

- 王曉菊，〈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農民的社會情緒〉，《俄羅斯學刊》，2012年第6期，頁43-48。
- 金雁，〈論蘇聯1927-1928年度的糧食危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頁84-92。
- 姜長斌，〈論從新經濟政策向全盤集體化的轉變〉，《史學集刊》，1984年第3期，頁66-74。
- 馬龍閃，〈取消新經濟政策原因新論〉，《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9年第2期，頁11-26。
- 章前明，〈1928年蘇聯糧食收購危機的直接原因——兼論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理論〉，《浙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97-102。
- 趙旭黎，〈新經濟政策前期蘇聯糧食政策的負面效應與農民反抗〉，《俄羅斯研究》，2013年第4期，頁172-190。
- 鄭異凡，〈在農民暴動的壓力下——蘇聯新經濟政策的起因之一〉，《探索與爭鳴》，2005年第10期，頁46-49。
- 鄭異凡，〈蘇維埃政權的危機和列寧的應對之策〉，《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2期，頁183-189。
- Кочетков, И. В. “Неурожай 1924 года: масштабы, причин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 ред.,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К 7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члена-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РАН, профессора В. А. Шишкин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05, с. 99-131.
- Яхутль, Ю. А. “Кризисы НЭПа: второй кризис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25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ысль*, 2012, №3. с. 64-68.

四、網路資源

- “О введении в действ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о едином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м налоге.” April 30, 1924. http://www.libussr.ru/doc_ussr/ussr_2009.htm (accessed March 13, 2018).

- Агарёв, А. Ф.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2005. <https://uchebnikfree.com/russia-history/krizisyi-nepa-30968.html> (accessed April 3, 2019).
- Плеханов, А. М. “Басмачество.” https://bigenc.ru/domestic_history/text/1863940? (accessed August 26, 2021).
- Селеев, Сергей. “Глаза и уши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 Как 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поощряла доноси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ерсантъ*, June 15, 2017.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325686> (accessed April 5, 2019).

Rural Crisis and Policy Adjust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24 to 1925

Zhao Xu-li^{*}

Abstract

It is widely believed in Chinese mainland academic circles that the burden of Soviet farmers in the period of New Economic Policy was milder than that in the period of War Communism, an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were generally eased. However,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archives of the state security organiza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peasants' letters from 1924 to 1925 contradict this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proving that there were crises in rural areas of the Soviet Union—peasant resistance movements such as terrorist actions, bandit movements, and uprisings occurred in some rural area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lso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fractured. These materials show the need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crisis in 1924-1925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which was an isolated socialist island, to the weak sense of political identity of people in the border regions with the new regime, an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rural crisis was abus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tax, incurring the resentment of the peasants and those soldiers who were from the peasantry, which was intensified by severe famine. The peasant uprising in Georgia in August 1924 shocked the Soviet leaders, symbolizing the outbreak of the limited rural crisis. The Soviet government, acutely aware of the crisis, decisively adopted the new policy of “facing the countryside,” and by drastically reducing the agricultural tax finally successfully settled the rural crisis.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peasants' incomes after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devia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s national goal of extracting peasants' wealth and developing industry,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elimination of rich peasants and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xt stage.

Keywords: Soviet Union, agricultural tax, rural crisis, New Economic Policy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